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74

2008年10月15日

讀《動物農場》

北京大學 李零

—

真正的鬥爭是在牲口和人之間。¹

在人類的統治下，動物有三種選擇，作野生動物，或畜牲，或寵物，只有三種選擇。

野生動物的命運最慘，不但被人類圍獵，生存空間越來越小，而且在叢林法則下，還時常受到其他野生動物的威脅。吃肉的要學會挨餓，吃草的要學會逃跑，沒有生活保障，沒有安全和秩序……

在所有動物中，只有他們才有一點點“自由”，不受人類直

¹ 喬治·奧威爾著、董樂山譯：〈《動物農場》烏克蘭文版序言〉，《我為什麼要寫作》，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第113頁。

接奴役的“自由”（“自由”的代價是苦難）。他們不像畜牲一樣，賣力賣命，最後的歸宿是屠宰場。

動物，要想有吃有喝，像畜牲一樣，又不賣力賣命，像野生動物一樣，最好的選擇是作寵物。寵物是上等動物，被人類接納，當作“家裡人”。說不定，主人死了，還有鉅額遺產。

現在，不是有動物保護主義嗎？我聽說，河南的豬都實行“安樂死”了。科學的理由據說是，被死嚇過的豬，肉都不好吃。所以，一定要用“人道的方法”來殺死。其情況似乎和羊相反——電視上說，沒有狼，羊肉就不好吃。

但這樣的待遇，前提是瀕危。種群數量太大的野生動物，一般是不受保護的，比如蒼蠅、蚊子和老鼠。

消滅野生動物，再保護野生動物——先殺後救，這是人類的邏輯。

奧威爾是一種現象，不是開始，不是結束。他的《動物農場》是一部成人童話，對理解 20 世紀上半葉的左右翼很有幫助，對理解當下的左右翼也很有幫助。

下面是我的讀書筆記，有點長。我先把故事講一遍。

（一）解題

書題（Animal Farm）有三種譯法，“動物莊園”、“動物農場”和“動物農莊”，傅惟慈翻成“動物農場”最好。在故事中，它是與“莊園農場”（Manor Farm）相對。1936 年，奧威爾和愛琳結婚，一度搬到赫特福德郡北白爾多克鎮以東的沃靈頓村居住，在那兒養了些牲口。這個村子離倫敦不遠，即故事所託。

Manor Farm, Manor 的本義是貴族莊園、領主莊園。傅惟慈翻成“莊園農場”最好。張毅、高孝先把 Animal Farm 翻成“動物莊園”，Farm 作“莊園”，這裡總不好再叫“莊園莊園”，故

取音譯翻成“曼納莊園”。其實，Manor Farm 是與 Animal Farm 相對，指的是人類農場。人類農場是人類管理動物，動物農場是動物管理動物，這是根本區別。

作者以“動物農場”和“人類農場”相對，代表衝突之兩極。“動物”是受侮辱受壓迫起而反抗的一方，“人類”是他們的對立面，試圖圍剿和消滅他們的一方。“動物農場”指社會主義國家，“人類農場”指資本主義國家。

過去，葉德輝（著名保守派文人，1927 年被殺）罵農運，有個對聯，上聯是“農運宏開，稻粱菽麥黍稷，雜種上市”，下聯是“會場擴大，馬牛羊雞犬豕，六畜成群”，橫批是“斌尖卡傀”，意思是“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但這裡，“動物”不是用來侮辱動物。有人把 Animal Farm 翻成“獸園”，不好。作者從小害怕老鼠討厭豬，但對廣大動物群眾，並無賤視之意。他是用“動物”指社會主義，不是用“動物”罵社會主義。

英文中的 animal，是有別於人類和植物的一切活物。動物農場的動物，主體是“馴化動物”（domestic animal），即我們中國人講的“六畜”，通常也叫“畜牲”。他們是家養動物或人化動物（這裡，我用擬人的“他們”，而不用“它們”），比其他動物更接近人類，因而不滿自己的動物處境。造反的起因是，人類太不拿他們當人，只當畜牲，或連畜牲都不如。

我們從動物立場看問題，造反確實有理。

動物都是“同志”。但“野生動物”（wild animal），比如老鼠、兔子和狐狸，算不算“同志”，動物大會表決，算。還有鳥類，比如棲息農場的鴿子、烏鴉還有麻雀等小鳥，他們算不算？也算。

雪球同志的定義是，只要是四條腿或兩條腿而長翅膀的，都算“同志”。

有人懷疑，“野生動物”是象徵工人階級以外的農民或其他成分的落後群眾，但動物農場中還有很多家養動物，更像這類群

衆。他們比野生動物更容易接受人類，不夠落後，不夠原始。

我看，真正的“野生動物”是少數民族、亞非拉。

(二) 角色

我們先介紹人類。

(一) 瓊斯先生 (Mr. Jones)，莊園農場的場主。他整天喝酒，醉醺醺，對手下的工人疏於管理。他們光擠奶，不喂草，引起母牛鬧事。其他動物群起響應，把瓊斯趕走。瓊斯流亡在外，住在威靈頓 (Willington，英格蘭有這個地名)，整天泡在紅獅酒吧 (the taproom of Red Lion) 中。威靈頓是人類居住的中心，當指倫敦。倫敦有個紅獅街。瓊斯失去農場，絕不甘心，勾結弗里德利克和皮爾京頓攻打動物農場，不成功，最後死在醉漢收容所中。俄國人愛酗酒。作者把他描寫成酒鬼，以他象徵十月革命推翻的沙俄統治者。此人絕非俄皇，乃指白俄。尼古拉二世是被布爾什維克處決，不是喝酒喝死的。革命，群情激憤不能已，送暴君上斷頭臺，乃歐洲傳統，不自俄國始，不自法國始，而是從英國開的頭，根本用不著大驚小怪。

(二) 弗里德利克先生 (Mr. Frederick)，狹地農場 (Pinchfield Farm) 的場主，指希特勒。他的特點，是“精明、強悍，成年累月同別人打官司”，“遇事斤斤計較，一點虧也不肯吃”。Pinchfield，字面含義是受擠壓的土地。一次大戰，德國是戰敗國，割地賠款，領土受擠壓。原書說，它“面積不大，但是經營得較好”。Frederick 是德國姓氏，德語作 Friederich，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或譯“弗里德里希大帝”、“腓特列大帝”）就姓這個姓。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第一帝國）最有名的皇帝，希特勒是大德意志帝國（第三帝國）的元首。他以第一帝國的繼承者自居，所以有這種比喻。

(三) 皮爾京頓先生 (Mr. Pilkington)，狸林農場 (Foxwood Farm) 的場主。Pilkington 是英國姓氏。Foxwood 是狐狸出沒的野樹林。英國人喜歡獵狐。原書說，它“是個經營不善的老式大農場，長滿了一叢叢小樹，牧場荒蕪，樹籬東倒西歪”，當指大英帝國代表的殖民體系。此人指誰？有人說是丘吉爾和羅斯福，我看是丘吉爾。羅斯福治下的國家，不像是“經營不善的老式大農場”。原書說，“皮爾京頓同弗里德利克兩人誰都看不起誰”，但都害怕“動物革命”。他倆是一夥，但有矛盾。

(四) 溫佩爾先生 (Mr. Whympers)，住在威靈頓的律師。他是拿破侖在動物農場實行新經濟政策後，第一個為動物農場和人類農場牽線搭橋，促成其貿易往來的經紀人。此人當指美國企業家哈默 (Armand Hammer)。1921 年，他到蘇聯救濟災民，後來在蘇聯開過鉛筆廠。1930 年，他返回美國，從蘇聯買走大批珍寶名畫。

這四個“人”，瓊斯是酒囊飯袋老廢物，弗里德利克和皮爾京頓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他們都不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和正面人物。我們再介紹動物。

(一) 豬。

動物農場中的豬，分種豬和肉豬。種豬是未經閹割專供配種的豬；肉豬是供屠宰吃肉的豬。豬最聰明，藉口管理，不幹體力活。他們是動物農場的領導階層，吉拉斯 (或譯德熱拉斯) 所說的“新階級”。人類的遺產，瓊斯先生留下的東西，都被他們霸佔，他們是“沒有瓊斯的瓊斯先生”，動物農場的真正利益集團。

1、老少校 (Old Major)，是動物造反的鼻祖。在故事中，他是一頭得過獎的灰白色大公豬，號稱“威靈頓美人” (Willington Beauty)。共產主義領袖，馬克思、恩格斯，都在倫敦長期居住，在西方名氣很大。此名當指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是恩格斯。恩格斯是第二國際創始人，當過兵，打過仗，好寫軍事評論，有“將軍”的綽號。恩格斯死後，第二國際分裂，伯恩施坦、考茨基強

調議會道路，是保守派；列寧強調武裝奪權，是激進派。兩派都源於恩格斯。

2、拿破侖（Napoleon），是農場中惟一的一頭伯克夏種豬，動物農場的三鉅頭之一。原書說他有“軍人風度”（第五章）。第十章，拿破侖會見皮爾京頓，他口叼煙斗，上身穿黑外套，下身穿打獵的馬褲（ratcatcher breeches，傅惟慈譯為“怪裡怪氣的豬褲”），腿上打皮綁腿（leather leggings，指馬靴），扮相酷似斯大林。論者往往把斯大林叫“共產主義波拿巴”，小說中的拿破侖無疑指斯大林。歐洲傳統，王很多，帝很少，帝號源出羅馬，日爾曼和斯拉夫系的國家，多稱愷撒（caesar）。我們說的沙皇（tsar）就是俄語的愷撒。此書最初譯成法文，害怕激怒法國人，曾把“拿破侖”改成“愷撒”。

3、雪球（Snowball），也是一頭種豬，動物農場的三鉅頭之一。在“牛棚戰役”中，因保衛動物農場有功，曾獲“一級動物英雄”勳章。但他與拿破侖政見相左，導致破裂。在動物大會上，拿破侖縱惡犬，趕走雪球。雪球即托洛茨基。十月革命，他是主要領袖，地位和影響僅次於列寧。內戰時期，他是紅軍創始人，也有赫赫戰功。但列寧死後，被斯大林排擠：1925年被解除黨內外一切職務，1926年被開除出黨，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圖，1929年被驅逐出境，1940年被蘇聯特工暗殺。

4、尖嗓（Squealer），是一頭口才很好的小肉豬，動物農場的三鉅頭之一，負責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有人猜，這是指布哈林及其後繼者（如日丹諾夫類的理論家），不一定，恐怕還是泛指斯大林的支持者。

5、四口小肉豬（four young porkers），當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拿破侖趕走雪球，取消動物大會，他們想發表不同意見，引起拿破侖反感。後來，被逼承認，與雪球同夥，被惡犬咬死。蘇聯大清洗，殺革命功臣，最著名的死難

者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圖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1924年，列寧死後，斯大林先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結盟，排擠托洛茨基，再和布哈林、李可夫結盟，排擠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死於1936年的第一次大審判，圖哈切夫斯基死於1937年的第二次大審判，布哈林、李可夫死於1938年的第三次大審判。

6、詩人小不點兒（the poet, Minimus），是為拿破侖唱讚歌的小肉豬，當指亞歷山大羅夫（紅旗歌舞團的創始人）等人。第一章，老少校教動物唱《英格蘭畜牲之歌》（Beasts of England），當指《國際歌》。十月革命後，蘇聯廢除沙俄時代的國歌《上帝保佑沙皇》，用《國際歌》代替它。Beasts of England，或譯“英格蘭獸”，不好。Beast有畜牲之意，從故事看，顯然指動物農場中的畜牲，而不是虎狼一類野獸。傅本譯“英格蘭畜牲”，更合適。第七章，拿破侖禁唱《英格蘭畜牲之歌》，小不點兒作了一首新歌代替它。新歌是指1944年的蘇聯新國歌《牢不可破的聯盟》（亞歷山大羅夫作曲，米哈爾科夫、列基斯坦作詞）。它只唱祖國，不唱國際。後來，小不點還創作了《拿破侖同志》，則指亞歷山大羅夫等人創作的《斯大林頌》。

7、粉紅眼（Pinkeye），也是小肉豬，負責為拿破侖品嚐食品，以防下毒。

（二）狗。

象徵秘密警察，地位僅次於豬。

- 1、藍鈴花（Bluebell），一種植物，這裡是母狗的名字。
- 2、傑西（Jessie），本來是女子名，這裡是母狗的名字。
- 3、品徹爾（Pincher），意思是鉗子，這裡是公狗的名字。

4、九條鉅犬（nine enormous dogs），分別出於藍鈴花和傑西。小狗剛一斷奶，就被拿破侖抱走，養在一個與世隔絕的閣樓上。後來，拿破侖趕走雪球，在動物農場搞大清洗，就是靠這些惡犬。

老鄉教我養狗，說最兇的狗，都是從小不見人的狗，² 拿破侖的狗就是這麼養出來的。

這些狗，1~3 是老狗，參加過仲夏暴動，身上有捷爾仁斯基的影子。捷爾仁斯基是契卡的創始人。四是 1~3 所生，指契卡、安全局、內務部、安全部一類組織（克格勃的前身）。

（三）馬。

1、拳擊手（Boxer），是匹軋重的公馬，代表真正的工人階級。他參加過動物農場的所有革命活動，是個戰鬥英雄和勞動模範，但被拿破侖愚弄、欺騙和出賣。拳擊手常說的兩句話是“我要努力幹活兒”和“拿破侖永遠正確”，對革命忠心耿耿，但臨近退休，卻被拿破侖送進屠宰場。死後，他這兩句話，被拿破侖一夥利用，當作愚弄動物的口號。有人說，奧威爾筆下的拳擊手是以他參加西班牙內戰時的指揮官喬治·柯普為原型，但我覺得，他身上也有作者本人的影子。

2、苜蓿（Clover），是匹軋重的母馬，總是和拳擊手在一起。她也參加過動物農場的所有革命活動，是拳擊手的親密戰友。他的身上似乎有愛琳的影子（奧威爾的第一個妻子，她曾在西班牙陪伴奧威爾）。

3、茉莉（Molie），是給瓊斯駕車的小白母馬，喜歡吃糖，臭美，愛打扮，經常逃避集體勞動，代表奴性不改、懷念舊社會的人。“牛棚戰役”後，茉莉叛逃威靈頓，給一家酒館的老闆駕車。Molie 是 Mary 的愛稱。有人說，奧威爾筆下的茉莉是以他的遺孀索妮亞為原型，不知是否可靠。索妮亞長得很漂亮。

（四）奶牛。

無名，疑指農民和普通勞動者。

（五）綿羊。

² 李零：〈大營子娃娃小營子狗〉，《花間一壺酒》，同心出版社 2005 年，第 277~287 頁。

無名，疑指最愚昧的群眾，特點是馴服和盲從。例如他們總是動不動就狂呼口號“四條腿好，兩條腿壞”（雪球發明的階級鬥爭口號）。

（六）山羊。

穆瑞爾（Muriel），是一頭白山羊，常和本傑明在一起，沒什麼突出表現。奧威爾的動物農場有沃靈頓村的影子。他在沃靈頓村養過一頭母山羊，就叫這個名。

（七）毛驢。

本傑明（Benjamin），男子名，源出希伯來語，意思是“幸運兒”。他是動物農場中年齡最大、脾氣最壞、冷眼旁觀、喜歡說怪話、看笑話的傢伙。他的口頭禪是“驢子活得長”（意思是，看誰活得長）。有人說，作者是以他比自己，不合適。奧威爾喜歡馬而不是驢。他身體特差，根本活不長。

（八）老貓。

無名，在書中是二流子和落後分子的象徵。他好吃懶做，不勞動，經常逃會，幹事的時候瞅不見他，但動物農場成立野生同志再教育委員會，他卻積極報名，想借職務之便，抓點麻雀、老鼠吃。動物中有所謂寵物（pet），貓、狗是這一類。貓和狗還不一樣。狗還幫助狩獵，看家護院。貓，除了抓耗子，啥都不幹，特愛睡懶覺（如果有吃有喝，就連耗子都不抓）。

（九）鴿子。

無名，和烏鴉相反，不是傳播宗教，而是向其他動物農場傳播革命思想。50年代，畢加索畫的和平鴿（作於1949年）在中國很流行，北京展覽館（初名蘇聯展覽館）的高塔上有，郵票上也印。左翼當紅的1944年，他加入過共產黨。

（十）烏鴉。

摩西（Moses），是瓊斯先生養的一隻烏鴉。他什麼活兒都不幹，專賣口舌，說雲端後面有座糖果山（Sugarcandy Mountain），

人死了都要到那兒去。糖果山每天都是休息日，首蓆一年四季長青，籬笆上長滿方糖和亞麻子餅。革命前，為了喚醒動物的革命意識，豬給所有動物做工作，叫他們不要相信摩西的說教。仲夏暴動，摩西逃跑。動物共和國成立後，摩西又飛回來。摩西本是《聖經》中的猶太領袖，出埃及，立十戒。這裡指俄國的東正教。十月革命後，蘇聯政府曾限制東正教。1943年，為了支持對德戰爭，蘇聯政府與東正教達成和解，東正教才重新活躍起來。

(11) 雞、鴨、鵝。

無名，代表最無知的一般群眾。

(12) 麻雀、老鼠、兔子、狐狸。

這些是野生動物。

(三) 故事梗概

這部童話等於一部壓縮版的《聯共（布）黨史》（1917~1943年）。故事的場景雖被安排在英格蘭，但諷刺對象是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奧威爾說，他的故事是取自蘇聯，但對內容作了壓縮處理，年代次序有所顛倒。原書共十章，無標題，這裡試加提示性的小標題，做一點歷史解讀。

第一章，〈老少校的夢〉，是講動物造反的起因。老少校年紀大，臨死前，在大穀倉召集動物大會，把他的造反之夢講給動物聽。他說，英格蘭有足夠的食物，可以讓所有動物都過上好日子，但不勞而獲的人類卻巧取豪奪，把全部剩餘榨光。他勸他們，千萬不要相信，人類富裕，動物也會繁榮，只有造反是惟一出路。他教他們唱《英格蘭畜牲之歌》。造反之夢即共產主義，《英格蘭畜牲之歌》即《國際歌》。

第二章，〈趕走瓊斯〉，是講動物造反。老少校死後，豬把老少校的教導總結成“動物主義”。造反比所有動物期望的日子

都來得早。仲夏日 (Midsummer Day, 6月23日, 即約翰施洗節), 母牛暴動, 引起所有動物造反。動物佔領瓊斯家, 驚其豪富, 一致決定, 誰也不許入住, 保持原樣, 辦博物館。豬把“動物主義”簡化為“七戒”, 獲得一致通過。故事這一段, 是指1917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後, 《國際歌》成為蘇聯國歌。

第三章, 〈自己管理自己〉, 是講革命後, 動物組織生產自救、設置各種管理機構和開展識字運動。動物當家作主, 幹活很賣力, 特別是拳擊手和苜蓿。豬是管理階層, 不勞動, 光呼口號, 為動物加油。每星期日, 動物在大穀倉開動物大會, 會前要昇旗。雪球為動物農場設計旗子, 旗是綠旗, 圖案是牛的白蹄子和白犄角。學文化, 羊和雞、鴨太笨, 背不下“七戒”, 雪球把它簡化為“四條腿好, 兩條腿壞”。拿破侖跟雪球處處唱反調。他對雪球組織的各種委員會毫無興趣, 更關心養狗, 專門培養看家護院的狗崽子。牛奶和蘋果被豬霸佔, 引起不滿, 尖嗓說, 豬為大家操勞, 理應如此, 不然, 瓊斯就會復辟。他拿瓊斯嚇唬動物。故事這一段, 相當十月革命後到1918年初。牛蹄牛角旗是暗示鐮刀斧頭旗 (蘇聯國旗)。

第四章, 〈牛棚戰役〉, 是講動物農場打敗人類的武裝干涉。動物農場是全英格蘭惟一由動物自己管理自己的農場。他們的成功, 鼓舞了其他農場的動物。這一年, 農村各地, 不斷掀起造反的浪潮。人類的代表, 弗里德利克和皮爾京頓, 感到大恐慌, 勾結瓊斯, 對動物農場進行武裝干涉。在雪球的英明指揮下, 動物擊退了人類的進攻, 是為“牛棚戰役”。雪球和拳擊手, 戰功卓著, 獲“一級動物英雄”勳章。故事這一段, 相當1918~1920年, 即蘇聯的內戰時期。1920年11月, 蘇聯戰勝歐洲列強的武裝干涉 (有14個國家參加) 和白軍叛亂。

第五章, 〈放逐雪球〉, 是講拿破侖趕走雪球。拿破侖和雪球有兩大分歧, 一是先建風車發電, 減輕勞動, 每週工作三天, 還是先抓糧食, 解決吃飯問題; 二是先自己武裝自己, 還是先放

出鴿子，鼓動其他農場造反。他們的爭吵，把農場分裂成兩派。關鍵時刻，拿破侖放出惡犬（悄悄養大的狗崽子），趕走雪球，成立特別委員會，取消動物大會，用鐵的紀律代替動物民主。故事這一段，相當 1921~1928 年，主要講蘇共黨內的激烈爭論。1924 年，列寧死後，斯大林開始迫害托洛茨基，驅逐托洛茨基，掀起反托派的運動。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有兩大分歧，一是先工業化還是先集體化，二是一國取勝還是世界革命。十月革命，誰也沒料到，突然爆發，第二國際的領袖們說，不合法，必失敗。列寧說，孩子已經生出來了，難道還要到資產階級那裡領出生證？辦法只有一個，就是堅守陣地，等待援軍。他曾希望俄國革命會引發西方革命（如德國革命），不得已，才把目光轉向落後的東方（如中國革命）。他始終相信，只有世界革命才能挽救社會主義。托洛茨基站在列寧左邊，說沒有世界革命，也要製造革命；斯大林站在列寧右邊，只問蘇聯“一國”如何，建成建不成，守住守不住。斯大林說，沒有世界革命，蘇聯也能單獨建成社會主義。注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是三階段論（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不是兩階段論（把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合併成一個階段）。無產階級專政，指過渡時期（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無產階級為了鎮壓舊勢力的反抗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臨時採取的強硬手段，他們從不把無產階級專政叫社會主義。

第六章，〈同人類做買賣〉，是講拿破侖的新經濟政策。上一章，雪球被逐之後，拿破侖繼續造風車，說造風車本來就是他的主意。建造風車，造成物資短缺，拿破侖發現，必須同人做買賣。他不但以溫佩爾為經紀人，進行公開貿易，還同皮爾京頓和弗里德利克分別簽訂貿易協定，私下往來。此事同“七戒”發生矛盾，動物想不通：革命是同人類決裂，怎麼可以同人類做買賣？尖嗓給他們做工作，向大家保證，動物農場從來都沒這道禁令。豬搬進瓊斯家，睡在人的床上，動物記得，這也違反“七戒”的

第四條。尖嗓篡改“七戒”，說過去的規定，並不是說動物不可睡床，而是說不可睡鋪床單的床，只要撤床單，換毯子，就合理合法。最後，眼看風車就要建成，卻突然倒塌。拿破侖誣稱，風車是被雪球破壞。從此，代替瓊斯，雪球成了嚇唬動物的法寶。故事這一段，相當 1928~1936 年，即蘇聯推行國家工業化和集體化的時期。當時，正值世界經濟大蕭條。這段故事值得玩味。大家別忘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以中蘇交惡、中美建交為契機。現在，我們悔恨自責，怎麼沒早點開放，卻忘了當時的環境：封閉是因為封鎖，不是自己做個“鐵幕”把自己關在裡面。當年，“敵軍圍困萬千重”，掐著脖子，餓著肚子，怎麼發財？怎麼搞民主？

第七章，〈屠殺同類〉，是講動物農場的刑訊逼供、血腥殺戮。風車倒塌後，經濟形勢嚴峻，為了履行向人類出售雞蛋的合同，尖嗓下令，雞蛋必須全部上繳，引起母雞造反。拿破侖和尖嗓繼續用雪球嚇人：跟弗里德利克做買賣，就說雪球勾結皮爾京頓；跟皮爾京頓做買賣，就說雪球勾結弗里德利克。他們甚至造謠，說雪球勾結老鼠，在內部搞破壞，以雪球為藉口，殺害同類：如造反的母雞，表示不同意見的四口小肉豬，偷吃糧食的鵝，往飲水池撒尿的山羊，弄得人人自危，誰也不敢講心裡話。在此基礎上，尖嗓宣佈，造反結束，內外敵人都被消滅，《英格蘭牲畜之歌》已失去意義，從此不許唱。代替它的是小不點兒創作的新歌，歌頌農場新秩序的讚歌。故事這一段，相當蘇聯的大清洗時期（1936~1938 年）。蘇聯改國歌，用《牢不可破的聯盟》代替《國際歌》是在 1944 年。注意：蘇聯的工業化和集體化是自己捨自己，大清洗是自己殺自己。這些悲劇，都和四面圍堵沒有安全有關。

第八章，〈風車戰役〉，是講動物農場打敗弗里德利克發動的戰爭。動物大清洗是對“七戒”第六條的背叛。尖嗓篡改這一條，把“一切動物都不許殺害其他動物”改成“一切動物都不許無緣無故殺害其他動物”。拿破侖建立個人崇拜，小不點兒創作《拿破

倫同志》。拿破侖利用皮爾京頓和弗里德利克的矛盾，既同皮爾京頓維持友好關係，又與弗里德利克達成秘密協議。不料，弗里德利克悍然入侵動物農場，打破三角平衡。皮爾京頓幸災樂禍，希望就此消滅動物農場。但同樣讓人想不到的是，在拿破侖演說的號召下，拳擊手和所有動物，浴血奮戰，打敗了弗里德利克。這場戰役，是為保衛重新建成的風車，所以被命名為“風車之役”，但風車卻被弗里德利克炸毀。“風車之役”指蘇聯戰勝法西斯德國的衛國戰爭。“風車”指工業化。戰後，拿破侖一面嚴令禁酒，不許其他動物喝，一面暗中釀酒，只供自己喝。喝酒，是繼承瓊斯先生（暗示蘇聯繼承了沙俄帝國）。尖嗓篡改“七戒”，被大家發現，他把禁止動物喝酒的第五條改成“一切動物不許飲酒過量”。故事這一段，相當1939~1945年。當時，英、法希望德國打俄國，俄國希望德國打英、法，都想靠移禍他國，保全自己。1939年，蘇聯與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就是出於這種考慮。但1941年，德國還是選擇東進，大舉進攻蘇聯。1945年，德國戰敗。小不點兒創作的《拿破侖同志》，指亞歷山大羅夫創作的《斯大林頌》。

第九章，〈拳擊手之死〉，是講拳擊手被誘騙，慘遭殺害。“風車之役”後，動物歡慶勝利，成立動物共和國。摩西返回，繼續講他的糖果山，雖然豬們並不相信糖果山，卻破例允許摩西不參加勞動，享受啤酒津貼，幫助他們愚弄群眾，安撫群眾，穩定他們對其他動物的統治。相反，為革命立下汗馬功勞的拳擊手，卻被送進威靈頓的屠宰場，謊稱他在那裡得到精心治療。死後，為了欺騙動物，還為他辦追悼會，要大家學習這位先烈。故事這一段，相當德國戰敗之後。

第十章，〈革命把豬變成人〉，是講拿破侖與皮爾京頓和解。這一章是最後一章，當年參加造反的動物，老的老，死的死，革命被遺忘。“七戒”的最後一條也被修正，“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被改成“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

等”，動物農場的上層，豬狗先富起來，其他動物還是老樣子。最後一幕，豬穿上人的衣服，像人一樣，站起來了。他們備好酒筵，與皮爾京頓為首的人類歡聚一堂，舉杯同慶，慶祝他們的全面和解。皮爾京頓說，豬和人，從來就沒有利害衝突，目標完全一致，都是為了對付下等動物。拿破侖宣佈，廢除“同志”之稱，把老上校的骷髏埋掉，牛蹄牛角旗換成沒有圖像的旗，農場的名字也改回去，仍叫“莊園農場”。窗外的動物目瞪口呆，再也分不清誰是動物誰是人。這是指二次大戰結束後，蘇聯與英、美瓜分世界，揭開冷戰時代的序幕。故事講到這裡，我們不難發現，“牛棚戰役”、“風車戰役”，武力消滅動物農場，不容易。西方入侵，只有一個效果，就是把蘇聯變成一個高度軍事化的國家，國富民窮的國家（農業為工業、工業為國防的計劃經濟是最典型的戰時體制）。蘇聯不是被外部的武力所消滅，而是被它所培養的黨員所消滅。他們，很多都是白眼狼，特別是身居要職的黨員，更是“共產主義掘墓人”。他們把蘇聯積攢的財富分光吃盡，然後宣佈“告別革命”，搖身一變，號稱自由主義者。從“政左經左”到“政左經右”到“政右經右”，是其演變的一般軌跡。

故事的最後一幕，據奧威爾本人說，是指1943年，世界三鉅頭，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歡聚一堂，通過《德黑蘭宣言》（1943年），商定日後的“三家分晉”。

小說出版於1945年。這一年，《雅爾塔協議》決定了戰後的世界格局：世界被美、英和蘇聯重新瓜分，就像一次大戰一樣。

其實，講到這裡，故事並沒完，斯大林去世，波匈事件，蘇共20大，中蘇論戰，越南戰爭，中美建交，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柏林牆倒塌，前蘇聯和東歐易幟，全在他死後的50年裡。

不是“東風壓倒西風”，而是“西風壓倒東風”，歷史大翻盤。這是我們這一代人親眼看到的事情，接著奧威爾的故事。

最後，我把恩格斯的一段話抄在下面。他似乎已經預言到了

共產主義運動可能遭受的失敗：

……這一次我們可以直接從《宣言》開始，這也特別是由於科倫案件，在這次案件中德國的共產主義（特別是在勒澤爾的身上）經受住了畢業考試。

當然，這一切都只是理論；在實踐中，我們和往常一樣，將不得不限於首先要求措施堅決和毫不留情。麻煩也就出在這裡。我感到，由於其他政黨一籌莫展和萎靡不振，我們的黨有一天不得不出來執政，而歸根結底是去實行那些並不直接符合我們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在無產階級大眾的壓力下，由於被我們自己所發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黨派鬥爭中多少帶著激昂情緒提出來的聲明和計劃所約束，我們將不得不進行共產主義的實驗，並實行跳躍，但這樣做還不是時候，這一點我們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這樣做，我們會丟掉腦袋——但願只在肉體方面——就會出現反動，並且在全世界能夠對這種事情作出歷史的判斷以前，我們不僅會被人視為怪物（這倒無所謂），而且會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還能有別的什麼結果。在德國這樣一個落後的國家裡，它有一個先進的政黨並且同法國這樣先進的國家一起被捲入了先進的革命，只要一發生嚴重的衝突，一有真正的危險，這個先進的政黨就不得不採取行動，而這對它來說無論如何是為時過早的。然而這無關緊要，我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們黨的文獻中預先準備好在萬一真的發生這種情況時為我們黨作歷史的辯護。³

二

我在 1936 年以後寫的每一篇嚴肅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反

³ 〈致約·魏德邁〉（1853 年 4 月 12 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第 587~588 頁。

對極權主義和擁護民主社會主義的，當然是根據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⁴

在我看來，人們只有一視同仁地堅持要英國結束在印度不受欢迎的統治，才能去譴責發生在波蘭、南斯拉夫等國的犯罪。我屬於左派，因而必須在左派內部工作，儘管我十分憎恨俄羅斯的極權主義及其在我們國家的惡劣影響。⁵

奧威爾的代表作是《動物農場》（寫於 1943~1944 年，1945 年出版）和《1984》（寫於 1945~1948 年，1950 年出版），現在已被譯成 60 多種文字，銷量超過四千萬。出版前，他就擔心，此書可能正中保守派的下懷。情況果然如此。它們的出版，立刻引起了丘吉爾的極大興趣，英國女王也馬上派人買書。

這兩本書，很敏感。冷戰時期，英、美誇，蘇聯罵，罵和誇，都是拿這兩本書當“反共宣言”。1951~1954 年，英國人改編，美國中央情報局掏錢，拍成動畫片《動物農場》，故事的結尾，“人豬大團圓”被篡改：人去掉，光剩豬，完全變味兒。奧威爾的一批舊作被拿出來熱炒，也是乘了這股勢。冷戰氛圍下的閱讀趣味，決定了奧威爾的命運。他是被保守主義捧起來的。

前蘇聯和前東歐，還有咱們中國，大家初讀此書，都很震撼。很多人都問自己：他怎麼比我們還理解我們。正因為有強烈共鳴，讀者很容易相信，甚至比西方讀者更容易相信，這是一部反蘇反共的右翼作品。

但他們讀錯了，不管有意無意，他們只是讀出了他們想聽的東西，而不是奧威爾想說的東西。

⁴ 喬治·奧威爾著、董樂山譯：〈我為什麼要寫作〉，《我為什麼要寫作》，第 102 頁。

⁵ 喬治·奧威爾著、甘曉峰譯：〈致阿索爾女公爵〉，《奧威爾書信集》，貴陽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350~351 頁。

(一) 奧威爾是左翼

欲知民主，先知左右。

傳統意義上的右翼是西方議會中的保守派，左翼是西方議會中的民主派和激進派。右翼多半和遺老遺少、王公貴族和宗教勢力有關，而左翼則代表新興勢力，如各種民主派、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夾處激進、保守之間，往往是中間派。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極右翼，托派和無政府主義是極左翼。這是大致的劃分，情況經常變。現在，左右兩翼不斷分化改組，有所謂新左新右。很多玩經濟、玩選舉、玩戰爭的，都是右翼的變種。很多玩理論、玩環保、玩人權的（還有後殖民主義、東方主義、女權、同性戀，等等），都是左翼的變種。現在的西方左翼，避實就虛，避重就輕，一盤散沙，經常往右轉，是大家的印象。

奧威爾的立場是左翼民主派的社會主義，他既恨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又恨蘇聯的斯大林主義。英國的保守派，他也反對。

閱讀此書，知人論世很重要。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年）是英國左翼作家。他的特點是痛恨暴政，同情弱者。他始終同情勞苦大眾和被壓迫民族，對英國式的傲慢與偏見有深刻反省。他既反對英國的資本主義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也反對蘇聯的斯大林主義。可惜，現在的讀者只記住了他的最後一反，卻忘記了他的初衷：他是為反對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才批判斯大林主義，批判斯大林主義是為了捍衛社會主義。他理解的社會主義，是為被壓迫者和受害者說話。

奧威爾是個瘦骨嶙峋，醜陋敏感，喜歡自討苦吃，喜歡冷眼旁觀，為生活寫作，為寫作生活的人。臨死前，他立下遺囑：死後不要給他寫傳記。為什麼不要？因為他很重視生活體驗，也很追求文字完美。既要真，也要美。他的小說，大多取自親身經歷。但他對自己的生活很不滿意（“我這輩子大部分時間過得很糟

糕”），絕不想自暴其醜（“自傳只有在披露了某些丟臉之事時才可信”）。他追求的真是一種誇張的逼真，既有寫實性，又有文學性，亦真亦幻。他寧願把他的書當自己的傳記。

他的早期作品，本身就是自傳或半自傳性的東西。《緬甸歲月》（1934年）是取自他在緬甸當警察的經歷（1922~1927年）。他對英國在印緬地區的統治充滿負罪感，因此辭職不幹，放棄優厚的薪水，立志當作家。回到英國後，他深入社會底層，當了流浪漢。《巴黎倫敦落魄記》（1933年）就是寫他和流浪漢、乞丐、罪犯、娼妓相處的“赤貧之樂”（1927~1929年）。《牧師的女兒》（1935年）和《保持葉蘭茂盛》（1936年）是他在倫敦當中學老師和書店店員時（1929~1936年）所寫，主題是“窮”，大寫金錢的壓力。最後，他還到英國北部調查煤礦工人（1936~1937年）的生活，寫成《通往威岡碼頭之路》（1937年）。他在大英帝國治下的殖民地生活過，在英國社會的底層生活過，目睹大蕭條下的社會貧困，使他從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起碼在感情上，他是個社會主義者。

他的書就是他的傳記。這個人很複雜，也很簡單。

第一，他不是理論家，只是文學家，按他自己的說法是政治文學家。他從不諱言自己的政治立場，宣稱自己的文學是純文學。雖然，在《1984》中，他也使用過當下時髦的“做愛解構政治”的手法（“腰部以下的叛逆”），但他絕不把這叫做“純文學”，像港臺的文學評論家那樣。通常所謂的“奧威爾風格”就是政治與文學的完美結合。他是憑生活經驗和直接感受，用最簡潔明快的語言說出大實話的人，並不在乎讀者的好惡。這種語言很有穿透力，有所謂“窗玻璃”之譽。

第二，他是左翼，但不是共產黨員。左翼派別很多，大別有三種：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有人說他是托派分子，不對；說他是無政府主義者，也不對。他是無黨派的社會

主義者。要說接近，也是社會民主主義。他是英國獨立工黨的支持者，是接近工黨立場的社會主義者。當時，左翼走紅，入黨很時髦。特別是法國和意大利，多少大學者、大文學家、大藝術家，紛紛加入共產黨。共產黨是左翼中流，但左翼不等於共產黨。他對追隨蘇共的左翼，總是冷嘲熱諷，是個非常孤立的人。

第三，他只活了 46 歲，生當 20 世紀上半葉。第一次世界大戰，他還小。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完，1950 年，他就走了。他是個前冷戰時期的人物。真正的冷戰，他只看到個頭，但他預言了冷戰時期。他的影響，生前不如身後。當時的右翼，有普通右翼（如英國的保守黨）和極右翼（如德、意法西斯和西班牙的佛朗哥）。他不屬於這個陣營。他罵蘇聯，是罵蘇聯變質，勾結英國保守黨，跟德國和日本示好，背叛本國革命、出賣他國革命（如出賣西班牙革命），不是罵社會主義。

他是左翼，不是右翼，這點毫無疑問。

（二）當左翼，不容易

奧威爾的書，是左翼批左翼。左翼批左翼，右翼當然高興。但他畢竟是左翼。

革命是件高尚的事，也是件殘酷的事。魯迅翻過《毀滅》。他早就講過，革命都是沾血帶污。

當左翼，不容易。窮人，沒錢，沒文化，沒有軍事訓練和政治經驗，相當激進，相當暴烈，不怕兇，就怕窮。左翼知識分子相反，最怕最怕，是個人不自由，還有破壞文化（海涅和傑克·倫敦都有這種恐懼）。他們和窮人鬧革命，難免格格不入。這是左翼的最大困惑。

歷史上的造反起義，經常都是腹背受敵，前怕狼，後怕虎，“殺敵一千，自殺三千”，很多人都死在自己人的手裡。參加革

命，這也是考驗。

奧威爾曾嚮往革命，但革命對他很遙遠。在英國這樣的國家，在美國這樣的國家，遠離歐洲大陸，遠離真正的革命，要想體會革命，難。

但奧威爾的時代，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整個歐洲，到處充滿火藥味。他還是體驗過革命。

西班牙內戰是二次大戰的序幕，也是歐洲各派政治勢力殊死搏鬥的縮影。即使最保守的估計，也是死了 50 多萬人。這是二次大戰的彩排。右翼背後有德、意法西斯，左翼背後有蘇聯，英、美看熱鬧。這場戰爭，不僅包括左右翼之間的鬥爭，也包括左翼內部的鬥爭。

1937 年，奧威爾投身西班牙內戰，站在共和軍一方，同法西斯作戰（海明威和白求恩也參加了）。他曾以為，戰爭會帶來偉大的社會變革，但結果卻是一場悲劇。革命被革命出賣，自己人殺自己人，輸掉了這場戰爭。

當時的左翼，主流是蘇共支持的共和派。他想加入國際縱隊的正規軍，被拒絕，因而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領導下的民兵組織。可憐的奧威爾，他在戰場上吃過法西斯（佛朗哥長槍黨）的槍子（打穿脖子），卻被當作托派同情者，被蘇共下令追殺。為了討好英、美，馬統工黨被蘇共取締和追殺。他的很多戰友被關被殺，自己是死裡逃生。他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1938 年）就是寫這一段。

他目睹了左翼殺左翼的殘酷場面，體會了自己人背後開槍的滋味。這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理創傷。他沒到過蘇聯，但體會過自己人殺自己人。

我們的前輩，有類似經歷。

1966 年冬，在大別山區，有位卸甲歸田的老紅軍跟我講過鄂豫皖蘇區的肅反。我還記得，他是坐在一間黑咕隆咚的老屋中，燒樹墩取暖，滿屋都是煙，什麼都看不清。我第一次聽說，那麼

多的革命者都是死在革命的刀下。

這兩年，我到湖北監利縣和洪湖市跑過，調查湘鄂西蘇區的四次肅反。我到過當年殺害紅軍將士的地點，參觀過當地的博物館。展館中陳放著地下出土的遺物：鈕扣、繩索、手銬和銀元。那裡有長長的烈士名單：段德昌、段玉林、王鶴、王一鳴、孫德清、曠繼勳、柳直荀、李劍如……，紅六軍和紅三軍的將領，幾乎所有，全被夏曦他們殺掉了（曠繼勳是在長征途中被張國燾殺害）。

在洪湖市的瞿家灣，我看到了段德昌的烈士證。他是洪湖蘇區的創始人，卻慘死於自己人的手裡。證書是1952年8月3日毛澤東簽發，“中央字零零零壹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烈士證：

查段德昌同志在革命鬥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

“革命”加在“烈士”前面，二字很沉重。

（三）革命的悲劇

1938~1939年，奧威爾在摩洛哥養病，寫成《上來透口氣》。他很壓抑，懷念過去（童年時代的英國），不滿現在，預感到戰爭即將來臨，對未來充滿恐懼。

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年），是當時的“三國演義”。英美、蘇聯和德國是世界的三極，就像中國的抗戰，國民黨、共產黨和日本，也是三極。三極變兩極，都是敵人之中選朋友。這就是政治。

奧威爾的選擇是什麼？

最初，奧威爾是個和平主義者，不希望英、德交戰，然而，戰爭一爆發，他立刻成了一個愛國主義者，反抗納粹沒商量。

戰爭期間，奧威爾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東方部工作，服務於英國的戰時宣傳。這期間，他寫過不少評論和隨筆。有人說，他的文章比書更漂亮。戰爭結束前，1943年11月至1944年

2月，他寫了《動物農場》。

這本書，說出了作者最深的憂慮。

奧威爾相信，自由資本主義已經到了末日，但法西斯主義不是出路，蘇聯的極權主義也不是出路。他害怕，德國戰敗後，左翼風潮席捲歐洲，蘇聯模式將控制世界，大家再受二遍苦。儘管很多左翼人士認為，他不應該在蘇軍攻克柏林取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時刻出版此書（此書出版於1945年8月，德國投降在1945年5月）；英國國內有戰時的媒體管制，他們顧及與蘇聯的同盟關係，也給他施加壓力。但他卻說，恰恰是這一時刻，他要警告大家。

作者的寓言，為我們揭露了蘇聯變質的全過程。

這一過程是圍繞著“七戒”的改變。

什麼是“七戒”？請看小說第二章：

- 1、“凡用兩條腿走路的都是敵人”。
- 2、“凡用四條腿走路或者有翅膀的都是朋友”。
- 3、“一切動物都不許穿衣裳”。
- 4、“一切動物都不許睡床鋪”。
- 5、“一切動物都不許喝酒”。
- 6、“一切動物都不許殺害其他動物”。
- 7、“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

頭兩條，很關鍵。動物中的傻瓜，背不下這兩條，雪球把它簡化為“四條腿好，兩條腿壞”。最後，這兩條被修正成“四條腿好，兩條腿更好”（第十章）。

第3~5條，動物為了防止部分動物搞特殊化，寧肯拒絕人類的遺產。但奶牛的乳房漲了、樹上的蘋果熟了怎麼辦？總得有人吃喝。豬不但霸佔了牛奶和蘋果，還搬進瓊斯的豪宅，睡在瓊斯的床上，穿瓊斯夫婦留下的衣裳，甚至在留給動物老同志養老的專用牧地上種大麥，準備釀酒，還到人類的農場買酒，自個兒偷著喝。他們把第四條改成“任何動物不許在鋪被單的床上睡覺”（第六

章)，把第五條改成“一切動物都不許喝酒過量”（第八章）。

第六條，禁止動物殺害動物，也被改成“一切動物都不許無緣無故殺害其他動物”（第八章）。

第七條，所有動物平等，也被改成“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第十章）。

小說開頭，老少校說，人類剝削動物，壓迫動物，不合理，動物要翻身，造反是唯一出路。他的說法很合理。

但問題是，他們趕走人類，人類的遺產將如何處置？如果同人決裂，豈不是又回到了畜牲？如果同自己決裂，又由誰來當畜牲（不管本國，還是他國，總得有人當畜牲）？

所以，造反的結果是，只有一部分動物先富起來。革命把豬變成人，其他動物還是過著悲慘的生活。

讀《動物農場》，要看一頭一尾，特別是結尾。

小說結尾，動物與人類握手言歡，這是悲劇還是喜劇？

答案很清楚，這是悲劇。

（四）奧威爾的恐懼

《1984》和《動物農場》是什麼關係？附帶說一下。

《1984》是《動物農場》的續作。“1984”是把1948年的48倒過來讀，即從我出生那一年，展望三四十年後的情景。他所預言的時代恰恰就是我們這一代人親身經歷的時代，即所謂冷戰時期。冷戰時期，歐美是圍剿的一方，蘇聯、中國是被圍剿的一方。

很多社會主義國家的人讀這本書，都會有一種自然而然的聯想，覺得這就是早期的《古拉格群島》。他們更喜歡《1984》，以為此書後出，更能代表奧威爾的思想，故事還是諷刺蘇聯，這個理解並不對。

很多奧威爾的評論家都認為，從文學角度講，此書不如《動物

農場》。奧威爾本人也同意，過度渲染折磨場景，是此書的缺點。

《1984》分三部分，從真理部到舊貨鋪到友愛部，寫的是無奈——做愛——出賣。我印象最深是第二部的最後一章。這章的短歌，非常感傷，掩卷遐思，總是盤旋在心頭。

事實上，奧威爾的恐懼是從《動物農場》發端，問題集中在動物農場。《1984》只是其恐懼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放大。他的害怕，當然和蘇聯有關，但故事的場景卻不在蘇聯，而在英國。他害怕的是蘇聯模式席捲歐美，英國工黨和其他社會主義政黨也染上這種病，引起整個歐洲乃至全球的極權化（即右翼所謂的“赤化”），他的祖國也不能倖免。

奧威爾在《1984》中採用的不是童話、寓言，而是幻想、預言（很多作家都想像過未來的強權社會，如傑克·倫敦的《鐵蹄》，奧威爾只是其中之一），恐怖氣氛很突出，讀起來令人壓抑。《動物農場》是寫蘇聯，《1984》是寫英國和以英國為敘事中心的整個世界。

故事把1984~1994年的世界分成三個超級大國，歐亞國、大洋國和東亞國。歐亞國是俄國（蘇聯）吞併歐洲的結果，範圍是歐亞大陸的整個北部，1984年時已經存在。與它並存的大洋國是美國吞併英國和大英帝國殖民地的結果，範圍是南北美、英倫三島、大洋洲和南部非洲。東亞國是“又經過十年混戰以後出現的”，比前兩個超級大國要晚十年，範圍是中國、日本、蒙古和東南亞。北非、西亞、中亞和南亞是爭奪地帶。

這三個國家，都有核武器，一個拉一個，彼此衝突不斷，但並不真打，只是成心折磨這個可憐的世界。這是寫什麼？這是寫冷戰。

奧威爾筆下的大洋國，是由英社（Ingsoc，意思是“英格蘭社會主義”）控制的極權國家。它的權力機構下設四個部：真理部管宣傳，仁愛部管司法，和平部管軍事，富足部管經濟。黨的口號全是指鹿為馬：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這個社會是金字塔結構，頂端坐著的是老大哥（Big Brother，

簡稱 BB，不可理解為我們常說的“蘇聯老大哥”），老大哥下面是核心黨，核心黨下面是外圍黨，外圍黨下面是無產者。

原書說，上等人（核心黨）也可能被中等人（外圍黨）趕走，中等人有可能變成“新的上等人”，但受苦的永遠是下等人。作者是站在下等人一邊。

他批判大國之間的冷戰（“戰爭即和平”），批判種族歧視、等級特權和不平等（“自由即奴役”），批判用謊言篡改歷史（“無知即力量”）。他不相信“黨”，無論是核心黨，還是外圍黨，但他相信“未來屬於無產者”，“希望在無產者身上”。“無產者”的概念，是他的道義所在——儘管在他死後，英國的“無產者”已經面目全非，對其他國家的人民來說，他們也成了“上等人”，戰爭與革命，工業與污染，動亂與貧窮，全都送到了落後地區，但“下等人”的概念，還是到處存在。

即使在《1984》中，奧威爾反對的也不是共產主義，更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他痛恨的偽社會主義。

他們說時間能治癒一切創傷，
他們說你總能把它忘得精光，
但是這些年來的笑容和淚痕，
卻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樣。

鳥兒歌唱，
無產者歌唱，
但黨卻不歌唱。⁶

在奧威爾的感傷詞句中，我們看到的是“那個結實的不可打垮的身影”——在全世界各地。

他們的覺醒終有一天會來到，可能要等一千年。⁷

⁶ 喬治·奧威爾：《1984》，參見 <http://www.yifan.net/novels/foreign/1984/198418.html>。

難道我們還沒有讀出他心中的“社會主義”嗎？

奧威爾的預言，有些是對的，比如美、蘇稱霸的兩極世界，還有年代稍晚的東亞崛起（他在世時已略見端倪），但有些並不如此，比如蘇聯吞併歐洲，英、美成為蘇聯式的國家。他說，他並不相信，小說中的社會一定會到來；這部小說的地點放在英國，只是為了強調英語民族並不先天優越，同樣可能面臨極權主義的威脅。

這不是針對哪一國。

大洋國究竟像誰？左翼、右翼有爭論，有趣的是，很多左翼都認為，這明明就是自己的國家。更何況，先富的“上等人”欺負後富的“下等人”，還是以富國為源頭。

這裡有趣的是，故事反復提到“電屏”，也就是老大哥監視整個社會的那個無所不在的設備。這個發明，現在使用很普遍。監視器、攝像頭，哪兒哪兒都安——除了廁所（有人甚至提議，特殊情況也可安，比如有人在廁所裡交換毒品，經公安部門批准），特別是在“自由世界”，特別是在反恐戰爭愈演愈烈的現在。

學者多已指出，奧威爾是把他在 BBC 的工作經歷寫進了這部小說。他很清楚，戰爭宣傳總是充滿謊言（後來的冷戰也不例外），他想講真話。故事中的真理部，原型是什麼？很多讀者想不到，其實就是 BBC 的東方部。那是一個蜂窩式的辦公場所。BBC 的名稱本身，也使我聯想，它就是老大哥（BB）的公司（C）。

福柯曾把“監視”當作“規訓”（社會對人的強制馴化）的一環。老闆監視員工，校長監視教員，警察監視犯罪分子嫌疑人，“電屏”很有用。反過來，不可能。反恐提高了“電屏”的地位。

工程，可以用直昇機監視。天上還有衛星，可以監視一切。有人吹，衛星可以看見地面上的一張報紙。還有臭名昭著的麥卡錫時代，那時的竊聽，也轉回來了。對恐怖分子可不可以拷打，

⁷ 喬治·奧威爾：《1984》，參見 <http://www.yifan.net/novels/foreign/1984/198418.html>。

也被布什拿出來討論（其實已經用了，據說“很有用”）。⁸

說起辦公室，我會想起托夫勒（未來學家）。20世紀80年代，各單位組織大家看《第三次浪潮》（不光發書，還有電影）。老托說，革命是工業時代的產物，變成古董。我們已進入信息時代，技術萬能。不但革命不可能，就連足球也將消亡，你回你的花果山，我回我的高老莊——全都散夥，各回各的家。當時，有個朋友辦了份報紙。我問他，你們的辦公地點在哪裡？他說，哎呀！你真老土，居然連這都不知道，人家托夫勒說了，有了電腦，就不用上班。現在怎麼樣？電腦倒是有了，更得上班。都不上班，老闆怎麼當？

即使是民主社會，民主也不是至高無上。國家，上有上帝，下有老闆。老闆可以世襲，有如君主。

打卡，格子間加電腦，這是標準的辦公場所。

我們是這樣“走向未來”（當時有套叢書叫這個名）。

（五）創作靈感：小孩和馬

1947年3月，奧威爾為《動物農場》的烏克蘭文版寫了個序言。他向俄語讀者講了自己的經歷，講了自己的政治立場，講了此書的創作緣起。

這篇序言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他說，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不是出於什麼理論上的考慮，而是出於自己的親身經歷，出於對被壓迫人民的同情。

⁸ 參看：《參考消息》2008年10月8日第10版的“時尚英語檔案”欄的短文：Watching the Watchers（作者是Christopher Werth）。它說，“英國頗為自豪地被冠以世界監視程度最高的社會。這個國家有多達420萬個保安攝像頭（每14人一個），在下一個十年這個數字還將翻倍……”，“就在老大哥的鼻子底下，新一群遊擊藝術家和黑客開始把空蕩蕩的走廊和停車場裡拍下的單調的模糊圖像拿來為自己所用……”。

他是目睹了緬甸的殖民地生活才痛恨帝國主義，目睹了英國北部礦工的困苦無告才擁護社會主義。他是充滿負罪感，才一生清苦。當時，他還沒有明確的政治觀點。

第二，他說，他反對蘇聯的極權主義，也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出於自己的親身經歷。他在西班牙內戰中是被蘇共當托派分子追殺，很多朋友被關押和槍決，罪名是與法西斯主義者共謀。這一大搜捕與蘇聯國內的大清洗是同時發生，是大清洗的補充。當時，蘇共是左翼中流，很多知識分子都相信蘇共的謊言，他認為，作為倖存者，他必須揭露這類謊言。

第三，他說，他從沒有去過俄羅斯，他對蘇聯的瞭解是通過書報的介紹，僅僅是個旁觀者。“即使我有這力量，我也不想干涉蘇聯內部事物：我不會僅僅因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蠻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譴責他們，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當時當地的情況下，他們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最後這段話，值得玩味）。

奧威爾說，“在過去十年中，我一直堅信，如果我們要振興社會主義運動，打破蘇聯神話是必要的”。他從西班牙回到英國，一直想用一個故事來實現這一目的。有一天，在他居住的鄉間（沃靈頓），他“看到一個男孩，大概十歲，趕著一匹拉車的大馬在一條狹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馬一想轉彎，那孩子就用鞭子抽它，這使我想起，如果這些牲口知道它們自己的力量，我們就無法控制它們，人類剝削牲口就像富人剝削無產階級一樣”。

他說，“真正的鬥爭是在牲口和人之間”。

很多年前，我也想過這類問題，買過點講動物的書，想寫《畜牲人類學》。我覺得，古今統治術，全靠馴化——人類馴化人類。基於生物學原理的奴隸制和種姓制，並不純粹是古代的事情。正如共產主義可以回溯到原始社會，整個人類文明也可追到奴隸制。從此，人和人的差別，要比人和動物的差別還大。這是真正的分叉口（美洲，晚到19世紀末才廢奴；印度，至今仍有種姓）。

《動物農場》是以動物與人類決裂始，動物與人類和解終。在這篇序言的結尾，奧威爾特別指出，“許多讀者在讀完本書之後可能有這樣的印象：它以豬和人的完全修好收場。這不是我的原意；相反，我原來是要在一種很不諧和的高音符上結束，因為我是在德黑蘭會議以後馬上寫的，大家都認為該會議為蘇聯和西方建立了可能範圍內最好的關係。我個人並不認為這種良好關係會維持很久，而事實證明，我沒有錯到哪裡去……”

在奧威爾的筆下，“和解”並不是好詞。

二次大戰前，蘇聯為了向英、美示好，寧肯放棄西班牙革命；為了自身的安全，也曾修好德、日。二次大戰後，蘇聯和英、美瓜分世界，也與它的安全戰略有關。

這些都受到奧威爾的譴責，讓他覺得，和帝國主義沒兩樣。

但是，如果我們從蘇聯被圍剿的角度考慮一下，蘇聯不這麼辦，又有什麼選擇？

弱肉強食：強者欺人，不強被人欺，是列強的遊戲規則。

不被人欺，也不欺負人，難。

（六）矛盾的奧威爾

很多左派，都是葉公好龍，既盼望革命又害怕革命，既同情受壓迫的勞苦大眾，又害怕他們的愚昧和暴烈。更何況，他們面對的政治環境，往往都是“洪洞縣裡無好人”。

上面說過，奧威爾生活的時代，有三股政治勢力，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落實到國家，就是英美、德國和蘇聯。它們都是互相利用，互相拆臺，握手翻臉隨時來。

反對決定立場：有些人，因為蘇聯發生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寧肯和法西斯主義合作；有些人，因為害怕法西斯主義暴政，也不去譴責蘇聯的不義。只有奧威爾說，他都反對。

奧威爾的早年，1922~1937年，主要是痛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特別是大英帝國的殖民主義。1937年，他參加西班牙內戰，回國後為英國廣播電臺服務，則是反抗法西斯主義。1945年，同盟國的反法西斯戰爭即將結束，他又害怕極權主義會控制世界。

他是個“三反分子”，什麼都反。但他所反，互相都反，主要矛盾裡面還有主要矛盾方面，你到底以哪個為主？無庸諱言，奧威爾的晚年，他的心病，主要是蘇聯的極權主義，確切地說，是斯大林主義。

斯大林主義嚇跑了西方的左翼。

奧威爾辭世前，曾出過一個“黑名單事件”。

他有一位女友，西莉婭·佩吉，在英國外交部的情報研究處（IRD）工作。這個部門設立於1948年，目標是全球性的反蘇反共宣傳。

1949年3月，情報研究處派西莉婭看望奧威爾，想請他為他們寫東西或推薦他人寫東西。他有個筆記本，上面有135個人的名字，包括演員、記者和作家。他向西莉婭提供了其中的35個人（其中有卓別林、肖伯納等人），說明哪些人是共產黨的同路人或支持者，“不應被委以宣傳之任”。

1991年，這個名單被部分公佈，引起很大爭議。有人指責他是告密者，也有人替他辯解，說他只是不同意請這些人寫東西，並沒有叫當局抓這些人。

不管怎麼說，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奧威爾的天平畢竟是傾向於英、美，他很難掩飾自己對蘇共的恐懼。這是後來左翼紛紛向右轉的原因（注意：現在的西方左翼，在很多問題上可能比右翼還右）。

在《動物農場》的烏克蘭文版的序言中，他把蘇聯和英國做了對比。他說：

英國並不是完全民主的。它也是個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著極大

的階級特權和（即使在現在，在一場可能使人人平等的戰爭之後）極大的貧富懸殊。但是儘管如此，它還是一個人民生活了好幾百年而沒有發生內戰的國家，法律相對來說是公正的，官方的新聞和統計數字可以幾乎一概信任，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持有和發表少數派意見並不會帶來生命的危險。在這樣的氣氛中，像集中營、大規模強制遷移、未經審判就逮捕、新聞檢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沒有真正瞭解的……⁹

奧威爾是個社會主義者，但在他的價值體系中，自由和民主壓倒了一切。我在前面已經提到，他是個民主社會主義者。

他反對法西斯主義，西方主流社會也反；他反對極權主義，西方主流社會也反。自由民主是歐洲走出中世紀反教權、反君權的產物，這是西方主流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也是社會主義的歷史遺產。蘇聯拋棄這份遺產，他無法接受。

那麼，他又怎樣區別於他反對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呢？

為了民主，我們就應當放棄社會主義而擁抱帝國主義嗎？

這才是問題所在。

三

我們都是靠搶劫亞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們中間那些“開明的”人都認為這些苦力應該得到解放，但是我們的生活水準，因之也是我們的“開明”，卻要求這種搶劫繼續下去。¹⁰

冷戰時期，曾讓太多人感到絕望，特別是夾處於美、蘇之間的歐洲人。比如英國的“憤青”（憤怒的青年）憤什麼？就是二次大

⁹ 喬治·奧威爾著、傅惟慈譯：〈烏克蘭文版序〉，《動物農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05 年，第 1~4 頁。

¹⁰ 喬治·奧威爾著、董樂山譯：〈魯德亞德·吉卜林〉，《英國式謀殺的衰落》，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7 年。

戰的“英雄”還霸佔著這個世界。¹¹

現在，老一代的“英雄”差不多都已離去。他們留下的遺產是什麼？一是戰爭，二是革命。它們的變奏，構成了《動物農場》的主題。

(一) 必也正名乎？

奧威爾的書，《動物農場》和《1984》，共同主題是批判極權主義。什麼叫極權主義？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在西方的政治詞彙中，有兩組詞，黑白分明，最能體現西方的價值觀：

(一) 好詞

1、freedom（自由），和下面的詞是同義詞。只不過，liberty是借自法語，freedom才是英語本身的說法。

2、liberty（自由），有“解放”之意，我們常說的“解放”，其實就是“自由”。美國的“自由女神”是“解放女神”。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其中的“自由”（liberté）就是相當這個詞。一般說，擺脫奴役才有自由，自由是解放的結果，但英美革命的繼承人卻喜歡說，解放是自由的結果——守法即自由，沒有規矩的自由是不自由。

3、equality（平等），主要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國大革命的口號，其中的“平等”（égalité）就是相當這個詞。《禮記·禮運》的“大同”、《墨子·尚同》的“同”，庶幾近之。

4、fraternity（博愛），意思是手足之情、兄弟之情。法國大革命的口號，其中的“博愛”（fraternité）就是相當這個詞。孔子弟子子夏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庶幾近之。

¹¹ 約翰·奧斯本：《憤怒的回顧》，1956年於英國倫敦皇家劇院首次公演，隨即轟動整個劇壇，從而掀起了英國戲劇改革的浪潮。

5、democracy（民主），是希臘老詞，本義是人民統治。歐洲政體，古典時代是分為三類六種：君主制（monarchy）和僭主制（tyranny）是一人統治，貴族制（aristocracy）和寡頭制（oligarchy）是少數統治，共和制（republic）和民主制（democracy）是多數統治。亞里士多德說，這三組詞，都是前邊好，後邊壞：君主制最好，貴族制其次、共和制又其次；民主制是暴民政治，寡頭制和僭主制是暴君政治，都不好。可是現代政體，流行的卻是民主制。即使君主立憲，也是虛君共和，有沒有君主無所謂，關鍵是不能沒有議會。

（二）壞詞

1、autocracy（獨裁），是從 autocrat 來的。autocrat 是獨裁者（auto 是自己，crat 是統治）。我國帝王，稱孤道寡，惟我獨尊，西周時期，叫“余一人”，最像這個詞。這種一人說了算的統治者，在我國，那是司空見慣，並不都叫暴君。中國的暴君，那得“獨”到一意孤行、誰勸都不聽、隨便殺人、近乎虐待狂的份兒上。如武王伐紂，把紂叫“獨夫”，就是這種暴君。

2、dictatorship（獨裁），來源於 dictator。dictator，本來是羅馬共和國的民選執政官，通常有兩名，羅馬帝國的皇帝就是從大權獨攬的執政官發展而來，後來引申為“獨裁者”。卓別林的《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就是用這個詞指希特勒。過去，我們常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獨裁”。馬、恩和列寧認為，革命勝利後，無產階級為了鎮壓敵對勢力的反抗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必須如此。專政是過渡手段，下一段才是社會主義。

3、despotism（專制主義），despot 是暴君。暴君哪兒都有，沒什麼新鮮。比如希臘的僭主（tyrant），還有某些羅馬皇帝（卡利古拉和尼祿），就是西人常說的暴君。他們的傳統是小國傳統，對暴君很敏感。我國，秦以後的皇帝，以武力取天下，沒有貴族出身，有點像僭主。春秋的趙簡子和陳成子，漢魏的王莽和曹操，權力很大，也像僭主，但我們不叫暴君，只叫“亂臣賊子”或“亂世奸雄”。

4、absolutism（絕對主義，或絕對君主制），學者多把這個詞翻成“專制主義”，如中文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就這麼翻。我國常說的“專制主義”，是個沒有歷史概念的混沌。其實，absolutism 這個詞，和 despotism 還不完全一樣，它是專指資本主義前夜，高度集權的君主制。這種君主制，是和等級君主制相對，是和權力分散的封建制相對。它在歐洲，興起和衰亡，時間不一樣，主要在 16~19 世紀這一段（俄國拖到 1917 年）。如法國的路易 14、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俄國的彼得大帝，都屬於這類君主。歐洲各國，絕對主義越發達，革命越激烈，法國和俄國就是如此。absolute 的意思是絕對的。法王路易 14 說“朕即國家”，就是這種絕對主義。最近，劉北成、龔曉莊翻譯了佩里·安德森的《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¹² 就是介紹這類國家。

5、totalitarianism（極權主義），是 20 世紀才創造的新詞。極權概念的發明者是意大利哲學家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或譯金梯利，1944 年被意大利共產黨殺掉）。1920 年代，極權的概念經墨索里尼宣傳，廣為人知。這個詞是法西斯主義的代名詞。total 的意思是全面的或總體的。它強調的是黨國至上、集體主義、絕對服從和軍事化。totalitarian 是全面控制社會的大獨裁者。它的特點是全面控制：全面控制社會，全面控制個人，比傳統的專制主義和絕對主義更加專制，董樂山主張譯為“全面權力主義”。漢娜·阿倫特有《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 年），三聯書店剛剛出了譯本。¹³

（二）層層剝筍

上面的好詞，全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歐洲革命的遺產；

¹² 佩里·安德森著，劉北成、龔曉莊譯：《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¹³ 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三聯書店 2008 年。

壞詞，除極權主義晚出，全是前資本主義概念。它們彼此相反，有如堯、舜與桀、紂。

什麼是民主？民主是小國傳統。世界各大文明，早期都有這一段。

西方人講民主，老愛搬希臘城邦。其實，希臘的民主自由是建立在侵略和奴役之上。

希臘依山傍海，利於海外貿易，利於海外擴張，玉帛女子，可從外邊搶，像騎馬民族一樣。他們的城邦全是小國，去古未遠，古風猶存，還保留民主制。但即使希臘，也有六種政體，不光民主制。古希臘，一堆小國，鬆散聯合，居然打敗比他們強大的波斯帝國，很讓歐洲人自豪。亞歷山大征波斯，橫跨歐亞，建立龐大帝國，猶“小邦周克大邑商”，是希臘的頂峰，西人特愛吹，叫“希臘化時期”。但他一死，土崩瓦解。

同樣，羅馬早期也有民主制。他們擺脫共和，走向帝國，也是順理成章。羅馬帝國，後來居上，更龐大，更發達，但即使走向帝國，也還保留城市自治，國家依然很鬆散，難以控制各地的反叛和阻擋北方蠻族的入侵。

中世紀南下的蠻族，類似我國的匈奴、鮮卑，本來也很民主。他們的入侵，也是“小邦周克大邑商”。龐大的羅馬帝國，讓他們一衝，也土崩瓦解。他們的佔領，不像我們的西周封建，是歸同一個王來領導，更像五胡 16 國。今天的歐洲，小國林立，書不同文，車不同軌，就是承受這份遺產。

歐洲，大地域國家不發達，小國寡民的記憶特別深。即便現代大國，也多半是靠海外殖民複製的聯合體，很像城邦自治的古典時代。文藝復興，他們是“爸爸不親爺爺親”，寧肯認同希臘、羅馬，好像特民主。但他們也熱衷過專制，不止一次。

歐洲走出中世紀，一度提倡專制：抬君權，壓教權，抬專制，壓封建。18 世紀，他們還羨慕過我們的專制。

當然，這種專制，早已不是什麼傳統意義上的專制，而是上面說的絕對主義。好聽的說法是“開明專制”。絕對君主制取代等級君主制，權力太大，威脅市民社會，引起反彈，才有後來的革命，申民權，抑君權，再掉過頭來反專制。

他們是反封建在前，反專制在後，專制是封建的對立面。

歐洲的君主制，上有教權（宗教大一統），下有封建（國家多元化），王是小王，帝非常制。他們的帝，源出羅馬，拉丁系的國家叫皇帝（imperator，原義是得勝的將軍），日爾曼和斯拉夫系的國家叫凱撒（caesar）。查理曼帝國、神聖羅馬帝國和沙俄帝國，是歐洲的三大帝國，帝號多出羅馬，一般要由教皇封。法西斯主義源出意大利和德國，這不是偶然。意大利的前身是古羅馬，德國的前身是神聖羅馬帝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一種插著戰斧的笞棒）是復羅馬之古，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也是繼承神聖羅馬帝國。他們都是託夢於羅馬。羅馬是帝制的象徵。

西方民主，是專制的對立面。但現代民主，中間隔著中世紀，並不來自希臘。它是歐洲革命的產物（西方有一種說法，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如果是這樣，民主只有 60 多歲）。革命的理想是破舊立新，革命的結果是折衷新舊。

革命，是個意向紛紜的怪物，民主也是如此。革命，既有王冠落地，也有王權復辟。民主，也是既有英國立憲傳統和洛克的影響，也有法國啟蒙運動和盧梭的影響。民權挑戰君權和教權，結果往往是三權妥協。革命後的歐洲，不但教皇還在，九個國家還保留了王室。

極權主義不是歐洲歷史上的專制主義，而是個非常現代的觀念。

法西斯主義是一次大戰和經濟大蕭條的產物。當時的歐洲，很不景氣，到處瀰漫著對民主和進步的絕望，權力意志的鼓吹甚囂塵上。大家希望，強者出面，收拾亂局，哪怕權力大一點。極權主義是 20 世紀的觀念，不但和羅馬無關，跟中世紀也沒什麼關係。

極權主義是意大利法西斯的發明，純屬右翼概念，所有左翼都反對。但右翼罵左翼，也用這個詞。社會主義好一點，至少可以和民主掛在一起，歐洲左翼政黨，很多都是講社會民主的黨，甚至還是執政黨。共產主義就不行。他們說，蘇聯的社會主義和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一樣，也是黨國至上，暴君加暴民，這樣的社會主義是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是典型的西方話語。帝國主義瓜分世界，大局已定，所有國家，站隊劃線，壁壘分明，維持的叫民主國家，反對的叫極權國家（現在指共產主義）或民族主義國家（現在多以恐怖主義稱之）。絕大多數國家，歐美和日本以外的國家，都屬於後兩類。這種劃分很霸道。

可惜的是，奧威爾無法區別於上述話語。對左翼來說，這是難逃的困境。

奧威爾說，他天生憎恨權威，但權威反不掉（參看恩格斯〈論權威〉¹⁴）。暴君對他，是個揮之不去的噩夢。他的噩夢分兩種，一種是法西斯主義，一種是斯大林主義。他把兩種都叫極權主義。我們只有理解當時的氣氛，才能理解他的恐懼。當時的世界太野蠻——反對野蠻的，同樣很野蠻。

社會主義蘇聯和法西斯德國，一左一右，都挑戰過世界格局。它們都是帝國主義戰爭的產物：一次大戰，德國戰敗，倍嘗屈辱；俄國革命，強敵環伺，也被圍困。它們有同樣的創傷，同樣的困境。貧困和戰爭，扭曲了這兩個國家，二者頗具對稱性。可是，問題的根源在哪裡？正在格局本身。

《凡爾賽和約》，埋下二次大戰的種子；《雅爾塔協議》，也是冷戰的根源。在這種格局下，蘇聯的一切都是圍繞安全轉，對內對外，造成種種問題，很多戰略考慮，都被帝國主義化。這

¹⁴ 〈論權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41~344頁。

是革命的不幸。但只有站在格局的立場你才會說，它和法西斯德國是一家。

我們不要忘記，法西斯德國是最最反共的國家。他們和英、美的矛盾是由“瓜分”而引起，在“反共大業，同仇敵愾”上，他們和英、美是一家。

蘇聯的衛國戰爭，寫進《動物農場》，叫“風車戰役”。我們都還記得，皮爾京頓和弗里德利克是真正的一夥。當弗里德利克悍然攻打動物農場時，皮爾京頓說“活該”，他希望的是，弗里德利克替他消滅動物農場。

奧威爾絕不會同意，弗里德利克和動物農場是同一撥。這就像西班牙內戰，他雖痛詆左翼，恨其自相殘殺，但絕不會分不清左右翼。

他說，“這法西斯主義總得有人制止它”。為了抵抗德國，蘇聯人民付出了最大犧牲（不光死人，還有制度上的犧牲）。

我們不能把蘇聯紅軍和德國法西斯混為一談，就像我們不能把八路軍和日本鬼子混為一談。

（三）說“東方專制主義”

西方和東方的對立可以追溯到歐洲的古典時代。籠統的“東方”是由籠統的“西方”製造。“普世價值”是基督教話語。

早在古典時代，歐洲人就有一種說法，希臘人和羅馬人是“文明人”，他們的北邊，他們的東邊，都是“野蠻人”。中世紀，北歐和南歐成為同一個基督教世界，但異教的東方還是屬於“野蠻人”的世界。

古典作家說，西方特民主，東方特專制；歐洲人酷愛自由，亞洲人奴性十足。他們說的西方是希臘城邦，東方是波斯帝國。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偏見。

最近，美國拍了“樣板戲”，《亞歷山大》、《三百壯士》，就是再現這種偏見。亞述、巴比倫（現在的伊拉克）是最偉大的文明。波斯（現在的伊朗）繼承了這兩個文明，包括他們的地盤。它是一個文明程度很高、行政效率很高的大地域國家，所有考古發現和文獻史料都證明，希臘比不了。古典作家嘲笑波斯，正如同余入秦嘲笑秦，自豪的不過是戎狄的蠻風。

换位思考，亞歷山大征波斯，其實是蠻族入侵。歐洲歷史，從西到東，從北到南，總是落後征服先進，後來的羅馬，後來的日爾曼，都是如此。

古代東方有很多大國，沒錯。這些大國很專制，也沒錯。但很長時間裡，歐洲歷史學家對這些文明古國，少所見，多所怪，以為只有他們的小國寡民才叫文明，以為只有他們的鬆散聯合才叫文明，這是顛倒黑白。

近代歐洲，他們的地理知識有長進，但文化偏見沒有變。18世紀和19世紀，歐洲歷史學家沿襲了古典時代的偏見。他們把西方炮艦所及的整個東方，從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到印度的莫臥爾帝國，從古老的波斯到古老的中國，全都裝進同一概念。這一概念就是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

“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個十足的歷史混沌，它是一堆既模糊又混亂的印象：土地國有制和村社組織，大河灌溉和水利社會，絕對專制和普遍奴隸制，沒有法律，沒有貴族，還有早熟、停滯，等等。

黑格爾使用了這類概念。他把整個東方，叫做“暴政的舞臺”。

受黑格爾影響，馬克思也使用了這一概念，雖然他更關心的並不是“暴政”。

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正式提出是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中。但這一概念，在他第一次講唯物史觀的《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年）中就已存在。對比二書，我們不

難發現，他當年使用的“部落所有制”一詞，就是相當這一概念。他把“部落所有制”（相當亞細亞）排在“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相當希臘、羅馬）、“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相當日爾曼）之前。在他眼裡，這種形態更古老。所以，他還保留了黑格爾愛用的“兒童”一詞——和歐洲相比，我們只是早產的小兒！

今天，我們都已知道，“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個陳舊過時的概念，既不能概括東方各國的共性，也不能反映東方各國的差異，很多“特點”似是而非，很多“特點”不能成立。這一概念，經過近百年的研究，“日鑿一竅混沌死”，已經壽終正寢。

專制主義只是東方的特點嗎？並不是。東方，很多國家，早就大地域國家。這不能叫野蠻，只能叫文明。更何況，西方大國有專制，東方小國有民主，雙方都是既有民主，也有專制。西方民主、東方專制的歷史虛構是不能成立的。

我國近代反專制，說我們反對的是“封建專制主義”，這是誤用西方的概念。

我的朋友，劉北成先生，他是治歐洲思想史的。20世紀90年代，他就提出，人家歐洲，“專制”的反面是“封建”，這兩個詞怎麼可以捏一塊兒？最近，他再申此論，講得更清楚，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它要反的是“絕對主義”而不是“專制主義”，更不是“封建主義”。過去，我們把 absolutism 譯為“專制主義”已經不太合適，理解成“封建專制主義”就更加荒唐。¹⁵

研究中國歷史，同期比較很危險。我們要知道，中國和歐洲，從起點上就有很不同，它們在時間上有很大錯位。

第一，中國從很早就是大地域國家，君主制很發達。早期民主制，很難查考，沒有，不必找。要找，只能到蠻荒之地。蠻夷列傳諸蕃誌，漢族以外的地區倒是有。孟子說，“民為貴，社稷

¹⁵ 佩里·安德森著，劉北成、龔曉莊譯：〈中譯者序言〉，《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第1~8頁。

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好像很重視民，但這是“事後諸葛亮”，越是大講“民貴君輕”，越是說明民太輕。現代民主制，不管資本主義代議制，還是社會主義代議制，都是外來。兩千多年來，在我們的歷史記憶裡，中國只有君主制，沒有民主制。

第二，中國從很早就是中央集權的大帝國。這種大一統，兩千多年不變，每個王朝都是二三百年的連續體，和歐洲對比很強烈。西周時期，我們也有封建，但不同於歐洲封建。朝代和朝代之間，有異族征服，異族多被漢族同化，接受的是漢族制度，也不一樣。中國有專制可反，無封建可反。

第三，我國的帝制，從一開始，皇帝就有絕對權力。他把不同宗教、不同語言的衆多民族（ethnic groups）納入同一個版圖，類似現代的民族國家（nation）。政教分離，宗教被國家控制，國家大一統，宗教多元化，也類似宗教改革後的歐洲國家。這樣的國家，有君權可反，無教權可反。

中國的大一統國家，亞歷山大的帝國和羅馬帝國沒法比，中古時期的帝國也沒法比。它更像歐洲歷史上的絕對君主制。歐洲絕對主義，高峰是18世紀。難怪當時，歐洲各國，群拜康、乾為榜樣。這段蜜月期，很讓國人自豪，但19世紀和20世紀，隨著他們崛起，我們衰落，反被他們罵，就連老學生日本都罵（日本的現代化是個例外，它是從封建制直接進入現代國家，歐美特喜歡）。

近代中國是在罵聲中長大。別人罵，我們自己也罵。

我還記得，“文革”後，中國的志士仁人痛感中國落後，對“封建專制主義”曾力加撻伐。他們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把極權主義等同於絕對主義，把絕對主義等同於歷史上的暴君，老是分不清古代和現在，放著眼前說天邊。當時的大家，真是罵昏了頭，明明是眼跟前兒的事，什麼都賴秦始皇。現在倒好，自從有了盛世感，康、乾又成香餈餈，大家特別健忘。

長期以來，“專制一鍋粥”、“民主一鍋粥”，佔據了所有人的頭腦。特別是，他們對西方的民主神話深信不疑，還以為專制主義是中國特有的傳統。

這個酒勁兒應該醒醒了。

（四）我為革命說幾句話

我們這一代是生活在冷戰時期。冷戰時期，就是奧威爾講的“和解”。這種“和解”，其實是和而不解，就像電影中的場面：兩人同時拔出槍，冷槍頂著熱腦門，誰也不肯放下。

冷戰的結局是什麼？是同時開槍，同歸於盡？還是同時扔掉槍，實現全面和解？是一方扔掉槍，被對方打死或束手就擒？還是拿槍的逼扔槍的重新撿起，繼續玩前面的遊戲？

目前我們看到的，不是前兩種，而是後兩種。

這個時期，現在叫“後冷戰時期”。冷戰時期是和而不解，後冷戰時期是解而不和。後冷戰是冷戰的延續，我們只是看見個頭。

革命正在被遺忘，就像拳擊手死後的動物農場，變成荒誕的故事。今天重讀奧威爾，我想為革命說幾句話。

（一）革命是逼出來的，不是想出來的。

阿倫特說，戰爭是老詞，革命是新概念。“革命”曾經是個神聖的字眼兒，不僅是20世紀，也是17~19世紀。

回首20世紀，前後兩半，對比很強烈：上一半，世界只發生過兩件大事，兩次大戰逼出兩次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左翼風靡世界；下一半，是冷戰改變世界，世界告別革命，右翼捲土重來。

有人說，革命不合法。我很奇怪，革命還有什麼合法？

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有之，請自嗣同始”。

(二) 戰爭與革命有不解之緣。

阿倫特說，“迄今為止，戰爭與革命決定了20世紀的面貌”。¹⁶ 革命與戰爭有不解之緣，她說對了。儘管，她關注的是兩者都使用暴力，暴力給人類造成太多災難，讓她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她是德籍猶太人，避禍逃美，思考原點是反猶主義）。

戰爭是資本主義的DNA。西方的軍事傳統，不但有五百年的一貫邏輯，還保留了古典時代的野蠻（窮兵黷武，奴隸比例最高）。這是他們的祖墳。

革命是戰爭的解毒劑——雖然革命也有毒，它們都沾血帶污。

抗日戰爭，國際國內各種政治勢力在中國鬥法，纏繞糾結，紛紛紜紜，絕非書生所能解，但抗日戰爭成就了中國革命，這點毫無問題。

(三) 要罵革命，先罵戰爭。

近五百年的西方戰爭史，絕對是一部罪惡史。原罪可以原到最初的殖民戰爭，基本方式不變，基本邏輯不變，特點就是霸道。¹⁷

戰後的美國，打仗成癮，不打仗不能活（民主、共和兩黨都打，所有總統都打，除了越戰結束後的卡特）。1990年到現在，這18年裡，美國一口氣打過四場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不到最後一步，大家想不起越南戰爭（當年，無論左右，誰都反）。

人類的兩次世界大戰，很多“文明人”都投票支持過本國的帝國主義戰爭，就像希臘公民，以為戰爭是民主的延伸（戰爭與民主有不解之緣），正像奧威爾說的，“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西方人的傲慢和自私，幾乎毀掉了這個世界。

這四次戰爭，沒有一個乾淨。反戰是惟一的正義。

¹⁶ 漢娜·阿倫特：《論革命》，譯林出版社2007年，第1頁。

¹⁷ 李零：〈讀《劍橋戰爭史》〉，《花間一壺酒》，同心出版社2005年，第43~76頁。

（四）中國革命，前仆後繼，反專制是一面大旗。

中國歷史，專制主義很發達，夢被西方打破，乃有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走向共和，是反專制；北伐戰爭，打倒軍閥，統一南北，是反專制；抗戰勝利，共產黨用武力趕走國民黨，是反專制；現在提倡民主化，也是反專制。一切都順理成章。雖然，反和被反，經常具有對稱性，我們的反專制，老是用一種專制反對另一種專制，仿佛交叉感染。這是由殘酷的環境所決定。

（五）專制是革命的對立面，但革命也會造成專制。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要特別聲明，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權利。歐洲革命後，這樣的問題依然存在。因為當時，還有很多復辟活動發生，保守勢力也有長期的延續。專制主義，即使在革命成功後，也有很多變種，包括革命的專制主義。

辛亥革命後，中國南北對抗，北方是前清帝制的復辟勢力和武夫當國的北洋政府，代表保守勢力；南方是國共兩黨，代表革命勢力。由於新舊勢力找不到妥協的辦法，所有政治勢力，全都訴諸武力和強權，被人稱為“武化革命”。誰都無法否認，正是因為反專制，不能沒有集權，特別是過渡時期。孫中山看得很清楚，中國革命，不能一步到位。在他看來，起碼要分三階段（軍政、訓政和憲政），頭一段就是專制。馬克思講三階段，頭一段也是專制。

革命也會造成專制，有什麼奇怪？法國革命革出一個拿破侖，中國革命也革出一個袁世凱，道理一樣。陳伯達寫過《竊國大盜袁世凱》。袁世凱是歷史上的王莽嗎？不是。他和蔣介石一樣嗎？也不一樣。當時，很多政客都想推他出來當皇帝。

拿破侖是個複雜人物，他是個“革命皇帝”——革命革出個皇帝，太諷刺。拿破侖的專制，一般叫“波拿巴主義”，這就是革命的專制主義。當時，“極權主義”的概念還不存在。

革命的專制主義也要反。

（六）革命是為了什麼？

西方革命，有個深入人心的概念，革命是為了自由。阿倫特說，自由才是衡量革命的惟一標準。她說的革命，太乾淨，一不能沾暴力，二不能沾專制，這樣的革命哪兒找？

現在的世界，革命革傷了，革命革怕了。大家都說，英國革命好，美國革命更好，法國革命糟，俄國革命更糟。美國遠離歐洲大陸，自然資源，得天獨厚，白人畜奴，有人替他們幹苦活，獨立之後，什麼君權教權、階級矛盾，全都可以繞過去，多好。但這是特例，全世界沒有第二家。

阿倫特說，革命不是造反叛亂、以暴易暴，而是秩序的重建：法國革命，無法無天，革命革到不自由，不如美國；美國學英國，光榮革命不流血，先為自由立規矩（與保守勢力妥協），所以沒有混亂，沒有導致新專制。這是先自由，再解放。她甚至從語源上考證，革命的本義就是復辟。一句話，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¹⁸

有趣的是，中國的革命之父孫中山說，中國革命是因為自由太多。莊士敦（溥儀的英國老師）聞之，大惑不解。¹⁹ 他為什麼不解？就是因為有上面的定義。

孫中山說的自由，是清室遜位後，中國面臨的權力真空和無政府狀態。在他看來，沒有權威，不能結束這種混亂局面。我國的革命，用阿倫特的標準衡量，肯定最糟。但即使這樣的革命，也是追求新秩序。

（七）中國革命是為了救亡圖存。

革命，求自由而得專制，是很多人害怕革命、遠離革命的原因。但真正的革命和戰爭類似。沒有高度集權（哪怕是由議會授

¹⁸ 漢娜·阿倫特：《論革命》，第30~35頁。

¹⁹ 莊士敦著，陳時偉譯，馬小軍校：《紫禁城下的黃昏》，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第59~60頁。

權)，就沒有戰爭。沒有高度集權，也沒有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就像不流血的戰爭，好是好，就是太少（認真講，是根本沒有）。

權力集中就一定不好嗎？答案似乎很肯定。其實，資本主義國家的戰時體制，福利國家的計劃體制，社會主義國家的鎮壓敵對勢力，不發達國家的民族主義和權威主義，大部分都與戰爭和革命有關。它們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我們不能脫離當時的環境，把所有的集權都攪成一鍋粥，統稱為極權主義，特別是等同於法西斯主義。

中國革命，是為了救亡圖存（西方統稱為“民族主義”，他們的邏輯是，義和團是“民族主義”，八國聯軍才是“國際主義”）。雖然在歐洲革命的譜系中，這種革命沒有位置，流血太多，代價太大，但統而觀之，通而觀之，仍然很偉大。這不是國共兩黨哪一個人的功過問題，而是這個民族的功過問題，整個上一代人的功過問題（功過往往在一塊兒，人不是蛋糕，沒法拿刀切）。

（八）中國革命，不容詆毀。

當年，參加中國革命的人有個共同體會，讓他們刻骨銘心：西方列強一向操縱落後國家的政變和內戰（今天也如此，特別是美國）。它們支持的都是“弱國中的強者”，認定強者才能代表利益和秩序。這是西方列強的遊戲規則。強者經常換，但幾乎毫無例外，全是各國的保守勢力。

革命的老師並不支持中國革命。

中國革命為什麼會“一邊倒”，道理很簡單：北伐，只有蘇聯支持；抗日，最初也只有蘇聯支持。1937~1941年，長達四年，英、美都在看熱鬧。

早在抗戰勝利前，美國就已看出國民黨的腐敗（他們考察過延安，有對比）。戰後，機會均等，命運的天平更傾向國民黨，但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自己丟了天下，為什麼？

1950年，自由主義作家林語堂曾抱怨，“為什麼蘇俄在亞洲

有能幹而有效的工具為他們服務，而美國卻只有像蔣（介石）、李承晚和菲律賓總統這類 s. o. b（狗崽子，son of bitch 的縮寫）合作？這是本世紀最大的謎團”。²⁰

其實，這不是什麼謎團。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自由世界”的代理人，他們代表的並不是本國的民主，而是強國在海外的利益。從巴蒂斯塔、吳庭豔到本·拉登和薩達姆，向來如此。我們還沒有發現過另一種解讀。

21 世紀，時光逆轉，歷史倒讀，好像什麼都可以翻案，但中國革命的案不能翻。

中國革命，不管是誰，不管他們的意識形態如何，所有人的願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擺脫列強瓜分，二是結束四分五裂。先解決挨打，再解決挨餓，其他問題慢慢來。

人民英雄紀念碑還巍然聳立在天安門廣場。一百年來，所有為中國革命捐軀的烈士（從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

²⁰ 錢鎖橋：〈林語堂眼中的蔣介石和宋美齡〉，《書城》2008 年第二期，第 47 頁。